

目录

第一编 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互动

第一章 原“人”：五四文学观念的世纪末回眸

第一节 “个人本位”：文学启蒙共执的思想平台

第二节 “人的文学”：脱胎于指归不同的文学观念

第三节 “人的发现”：观念的差异是最大的差异

第四节 五四时代：文学症候与历史反思

第二章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文学谱系的生成

第一节 未雨绸缪：新文学的酝酿

第二节 山雨欲来：新文学的怀胎

第三节 新文学的两难（上）：在“言之有物”与“写实主义”之间

第四节 新文学的两难（下）：文学之“物”与科学之“物”之间

第三章 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

第一节 心声：“一则亦喜，一则亦忧”

第二节 换位：“文史不分家”与“文史亦分家”

第三节 问题：让学术成为学术的理由

第四章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第一节 “长时段”：文学与思想史

第二节 “博物馆”：文本与文学史

第三节 主体性：本体与个性化

第五章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道德的时代性：成熟的道德观念应该有准确的定位

道德的相对性：无论如何都将不是我们的首选

道德、理性与良知：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第二编 “问题”与“主义”的言说

第六章 “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

研究之研究：“问题与主义”的学术之争

“问题与主义”：思想文本的隐形格局

“导师”与“学生”：两种知识体系的相对凸起

第七章 从学理型政治到政治型学理：“问题与主义”两

种思想路径的后续言说

实证之一：“宣言”的底牌

实证之二：“实验”的底气

实证之三：“歧路”的底色

第八章 摇“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

——“问题与主义”之后的“主义与主义”之争

罗素：中国学界的又一深情期待

“浑朴”：知识界的共同思想面相

“主义与努力”：交相为用的思路格局

改良与革命：现代性内部的张力

第九章 摇“改良”与“革命”：20世纪中国启蒙逻辑的再论

摇释

启蒙与革命：两次逻辑命题的历史描述

“弱势”与“强势”：激进与保守的失衡

改良与革命：启蒙引导的两种现代路径

第十章《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性的转向 39

援《新青年》初期陈独秀的国家与个人观 39

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透视 44

援个人与国家关系思想的集束与辐射 47

援个人与社会关系在思想史上的闪断与整合 51

第三编 启蒙与革命之两难 60

第十一章 启蒙的悖论（启蒙—启蒙：世纪思想史上
的困惑 60

援“国民”与“民国”：启蒙招致的两难 60

援“共和”与“共斗”：悖论的必然生成 69

第十二章 超越位的人道主义：“五四”启蒙残缺性的再反
思 74

援“仁”：在士与知识分子之间 75

援“博爱”、“平等”、“自由”的先锋 79

援与启蒙的中西差异 82

援人道主义的倾斜 84

援走向民粹主义 89

第十三章 解构与突围：启蒙的历史与历史的启蒙 93

援启蒙的历史：世纪前 年后启蒙回眸与再现 95

援历史的启蒙：世纪后 年的启蒙比照与反思 100

第十四章 摇“新启蒙”与“后启蒙”：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
摇话的可能 10

援“新启蒙”和“后启蒙”：本是同根生 11

援“新启蒙”与“后启蒙”：相煎何太急 18

第十五章 摇从启蒙到革命：来自道德理想的引渡 26

摇员缘绪论：道德命题在革命中的位置 轶26

摇圆媛“革命”：来自道德理想“彼岸”的致命诱惑（上） 轶27

摇猿媛“道德”：“此岸”与“彼岸”的逻辑贯通（中） 轶31

摇源媛“自由”：在此岸道德泛化中无地彷徨（下） 轶35

摇缘媛结语：道德理想主义的再造 轶39

第四编摇激进与保守论衡 轶42

摇第十六章摇“想象的理性”：论辜鸿铭在 20 世纪思想史上

摇的意义 轶42

摇员媛“本是同根生”：作为五四人物的“怪杰” 轶42

摇圆媛“想象的理性”：文化守成的逻辑依据 轶44

摇猿媛特立独行：“守”出真性情 轶50

摇第十七章摇从高调到低调：陈独秀前后民主观的再审视 轶54

摇员媛高调与低调：对两种不同民主路径的理解 轶54

摇圆媛高调民主：“五四”时段的主旋律 轶57

摇猿媛低调的民主：后期思想见解的升华 轶61

摇第十八章摇“调和”与“独行”：李大钊从保守到激进的逻辑

辑依据（员缘源—员圆） 轶65

摇员媛“调和”：“共和”理想下的思想生成 轶66

摇圆媛“一力之独行”：新理想的诱惑 轶72

摇猿媛创造性转化：过渡的逻辑依据 轶75

摇源媛“物心两面的改造”：世纪之交的历史评说 轶80

摇第十九章摇国民性：沉郁的世纪关怀 轶82

摇员媛着眼点：同立于思想晕轮的圆心 轶82

摇圆媛兴奋点：“同唱一首歌” 轶86

摇猿媛归宿点：来自不同终端的关怀 轶89

摇第二十章摇超越与回归：近代文化启蒙与中国古典传统 轶07

摇员媛‘国粹’情结：以“心”入世的道德理想 轶08

摇圆媛‘力不从心’：“心力”超拔的道德阐释 轶03

摇猿媛古典人文性情：“自我”膨胀的“精神胜利法” 轶07

第五编摇现代性空间的开拓 轶14

摇第二十一章摇文化与政治的歧路：重议“五四”文化阵营
摇的思想格局 轶14

摇员媛‘不谈政治’的悖论 轶14

摇圆媛文学的“改良”与“革命” 轶18

摇猿媛‘人’之两种导向 轶22

摇第二十二章摇从“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看五四新文化运
摇动的思想谱系 轶28

摇员媛共识：朦胧启蒙理念下的“人”意 轶28

摇圆媛歧义：启蒙导师的“意念之差” 轶31

摇猿媛走向：“十字路口”的历史选择 轶33

摇第二十三章摇现代性空间的开拓：“新青年派”知识群体
摇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 轶38

摇员媛‘巴黎和会’：在“公理”与“强权”之间 轶39

摇圆媛‘劳工神圣’：在“体力”与“脑力”之间 轶42

摇猿媛人道主义：在“竞争”与“互助”之间 轶44

摇源媛马克思主义：在“竞争”与“互助”之间 轶48

跋摇走向人文学之路 轶0

第一编

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互动

第一章摇原“人”：五四文学观念的世纪末回眸

论及 20 世纪新文学的孕育、脱胎、成长，我们不能不从五四讲起，而讲这个文学论题，我个人首先想到了三个倡导文学观念最力的精英：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当然，在行文中我们为了进一步证实本文的论题，诸如鲁迅、李大钊这样的当事者也是不能缺席的。这里，笔者重在说明：五四文学观念发生前的胎动期至少有三重精神气质。这就是执意功利化、适意功利化和一意个性化的基本路径。追溯并爬梳五四文学的思想渊源，对今天跨入新世纪的作家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援“个人本位”：文学启蒙共执的思想平台

一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与该时代思想文化界的情形息息相关。五四这个特定的时代也不例外。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很快，这棵散发着深厚思想文化气息的梧桐就引来了“凤凰”，胡适就是其中的一员。尽管他们合作之初在“谈政治”与“不谈政治”的问题上有着根本的逆差，但本着求同存异的开放心态，还是

在那高低起伏的音符中唱出了不和谐的谐音。^① 后来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的参与更是精彩纷呈，一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万马齐喑、阴云密布的气象。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靠《新青年》起家的思想、文化、文学精英都在同一片蓝天下唱出了同一首歌：个人本位。

这是对传统的一次富有魄力的挑战。孔子的“仁”看起来是对人的关爱，但在终极意义上他老夫子说的不外怎样抑制私欲、克己复礼与如何修身齐家、一味奉公。为了社会的稳定，自我就是一截可有可无的盲肠。人的个性、独立性都被个体之外的“圣道”消解得一千二净。时临五四，陈独秀早在《青年》的创刊号上就声嘶力竭地吆喝起“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的买卖：“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②这即是“个人本位”的雏形。时至同卷源号，主编更是将卖点热化：“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进而，他公然将拍卖的槌声落定：“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③与陈独秀的义勇之气形成对比的是胡适的绅士“风情”。胡适的表白自然没有陈独秀直率、大胆、鲜明。他不是在有为之的论文里单刀直入，而是以一种优雅、温婉的方式于一篇谈“易卜生主义”的文学导论中抛出：“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个性即思想），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

① 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1998年。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员卷员号，1915年12月15日。

③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员卷源号，1915年12月15日。

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就没有生气,也不会进步了。”与同仁陈独秀的“谋个性之发展”并行不悖,针对“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的状况,他同样“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①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尽管低调,但仍是以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思想。周作人对新文学的提法一度不以为然,所以他采用“一竿子打到底”的办法提出:“人的文学”。审视几千年来人的资格的缺席,他说要去“辟人荒”。他为自己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开出了这样的理由:“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茂,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因此他继续引申说,爱别人必须“先知自爱”,大有“自私自利”的味道。^②在这一点上,它与胡适在《易卜生主义》所讲的道理可谓“大同”。

五四精英们就是在这一思想逻辑上共同酝酿、指导并身体力行着现代文学创作的。

圆媛“人的文学”:脱胎于指归不同的文学观念

我们看到,好像是历史的有意安排,陈独秀高调、胡适低调,接踵而来的周作人甚至有些消极。这如同“新”与“旧”的对比不能一概而论一样,其实高调与低调的处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质而言之,同是“以人为本”的个人本位主义论者未必能在一个锅里吃到底。这里,我们不妨就他们三位文学观念中“人本”的指归审视一下各自的人物原型之“来龙”。

①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源卷 远号,员圆年 远月 缘日。

②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缘卷 远号,员圆年 远月 缘日。

就个人本位主义的说法,我们这里不妨再给个“分析”的说法。这个从具有分析思维传统的西方舶来的概念这次却笼统得让精英们有了“自由”发挥的机会。与~~尼采~~尼采,在中国直到目前至少有三种与本论相关的翻译: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也许,这也是个人理解与~~尼采~~尼采的权利。

我们还是先从《新青年》的庄家陈独秀讲起。毋庸讳言,陈独秀心中一直呼唤的是“新青年”的形象。为此,他千呼万唤,奔走呐喊,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在时人心目中,他俨然就是一位手执如椽大笔、风风火火闯九州的热血汉子。对这样一位从辛亥革命丛林走来,而万变不离其“政”的精英来说,要他充当一回文艺女神缪斯,真可以说是难煞他喽!所以,陈独秀一在文学理论上亮相就有点“马失前蹄”的征兆。不客气地说,甚至有点“冒傻气”的味道。更何况他那点点滴滴的文学理论细胞,都是靠他的老乡胡适之“星星之火”点燃的呢!主编在首卷上就曾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口气拿《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当作了文艺女神的令箭,诸如什么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等数不尽的新名词、列不尽的洋作家一一查摆开来,但对中国文学的何去何从却让人如“丈二和尚”。在发表了谢无量的旧体诗后,他也会满怀信心地点评说“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并将谢无量的诗说成是“天下文章”。^①可当胡适寄来批评文字后,便没了主张:“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于是还诚惶诚恐地检讨着:“若来书所谓加以论断,以仆不学无文,何敢何敢!”^②带着这样的精神气质

① 陈独秀:《谢无量诗附识》,《新青年》员卷猿号,员缘年员月员缘日。

② 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通信》,《新青年》圆卷圆号,员缘年员月员日。

去论文学，自然是将外国当代作家笼而统之地一锅煮了。接下来的“爱我所爱”自然就让人无所适从：“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①不论是哲学家、思想家还是文学家，不论是古代的、近代的还是现代的，也不论适合不适合中国当前文学界，一股脑儿地标榜起来，多少有些乱点文艺谱的味道。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甘愿在文学更新上做先锋，为新文学的创作杀出一条血路，还是振聋发聩、气度非凡。那“愿拖十二生大炮为之前驱”的铿锵有力之声将永远回荡在中国新文学史的上空。他所主持的《新青年》为中国新文学的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创作平台。应该看到，如果没有他的蛮干，也就没有这样崭新文学时代的到来。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陈独秀既没有创作欲望，也没有实践这个观念，为何又要这样蛮干呢？

早在《新青年》创刊之前，陈独秀曾经是中国小有名气的最早创办白话报的人物之一。1904年在上海入主《国民日报》时就在深厚的政治情结下披上了文学创作的“虎皮”。他与苏曼殊翻译的《惨世界》哪里是在翻译，简直就是借雨果的“悲惨世界”述说中国国情。那法兰西的“尚海”就是上海，那狰狞的“满周苟”无疑是清朝“满洲狗”。这时的他们哪里还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四卷 五号，1917年 4月 15日。

顾及什么艺术性，简直就是拿文学当作发泄私愤的工具、社会改良的手段。《安徽俗话报》也许对学术界的同仁并不陌生，但陈独秀在上面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的史料不是每个人能耳熟能详的。《黑天国》的确是主编为了吸引读者来个“噱头”，可就是在这个噱头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却能发现与后期思想密切相关的微言大义。具有章回体形式的小说《黑天国》直接用主人公荣豪（既光荣又自豪）的语言抒发“索爱自由主义”、“惟自由万岁”的政治思想，通篇的寓意都是图解政治情怀的文字。

极度的功利化自然使他的文学观念也夹杂着政治那条甩不掉的尾巴。陈独秀惟一的一篇专论文学更新的文章中将“革新文学、革新政治”相提并论，并一改他当年向胡适“购稿”时的虚心，即使是凭借胡适文学思想的燎原，他也不领情似的指点江山起来：“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污垢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①原来，那一部分人惨无人道、“黑幕层张”，而我们这一部分人就要起而抗争、“洗净旧污”，即使流血也在所不惜。个人本位主义画地为牢，“新青年”也要带着镣铐跳舞。谁让你是新青年呢？是新青年就要有远大的理想、高深的主义，以及先解放他人、再解放自己的大事业情怀。按照这个逻辑，个人本位主义就是人本主义，人本就是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圆卷 远号，员年 月 日。

以人为本,而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是个人,以人为本就要将每个人当人看。这样,个人本位就很轻松地滑落到了“人人”的地牢里。而且“人人”很快就是他人的名词,“他人”又很快演绎为唯名论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民”、“群众”、“大多数”、“社会”等空洞概念。于是“自我”失落,个性消泯,思想阉割。这,固然是陈独秀在起初没有想到的,但实践就这么残酷地证明了这个事实与逻辑。

不言而喻,陈独秀在《~~与蔡元培~~》一词三维意蕴里,独独偏向了人道主义一隅。俨然是一个同情弱者、主持正义、讲求公平、打富济贫的救世菩萨。一面是可怜人间苦难的菩萨心肠,一边是冷酷相向的血腥气息,这与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兼爱、博爱思想不谋而合。不难发现,怨恨的主题在 19 世纪文学中频繁出现,不能不说与这种血腥的温柔和温柔的血腥息息相关。当功利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念一步一步走向“可怜平民的哭声”的时候,陈独秀开始关心多数,而对“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大加斥喝,并希望世界上充满“友爱互助情谊”,追求“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生活。^① 为了迎合主编之意,李大钊、周建人、高韬石等一批作者也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在《新青年》上大谈特谈“生存竞争与互助”问题。李大钊就曾要求把“协和、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② 这完全是伦理、道德之人道主义的克隆者。深究该提法的原动力,不外乎对人(更准确的说是人类)的关爱。

① 陈独秀：《本志宣言》，《新青年》第 2 卷 5 号，1915 年 5 月 1 日。

② 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 1 号，1918 年 7 月 2 日。

李大钊介绍文豪托尔斯泰不是因为他的文学艺术审美价值，而是因为“托氏文字字字皆含血泪”。^① 他与陈独秀的“人道”一唱一和，就不是什么功利不功利了，而是不折不扣的极度膨胀型号的大功利。

同样是出于对人的关爱，胡适的 ~~与陈独秀~~ 则是一副温和、收敛的姿态。固然，文学的完全超功利并不现实，但在胡适身上我们看到的“功利”则是“功夫在诗外”的功利（以下我将之称为适意功利）。至少，他不是与政治暧昧、缠绵的那类。早在 1917 年刚刚回国之时，他就与主编陈独秀彻夜长谈，并达成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默契”，用胡适自己的话就是决意要在“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这个非政治的基础也包括了“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个性的基础”。打个迂回，适意而为，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胡适。从他的言谈举止，我们能领略到的是一种扑面而来的人文主义气息。这种人文气息充分得力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传统。

胡适的人文主义精神气质可以用彼得拉克通俗的语言来理解：“我不想变成上帝，……我是人，只要凡人的幸福。”“人文主义主张人的全面”，只要是个性的全面发展。^② 胡适的注重社会人生而远离政治，正迎合了这一传统。那篇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文学改良刍议》实属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将文学与人生之密切关系擢拔出来的文字。他既不同意“文以载道”，也对“游戏消闲”嗤之以鼻。在美国曾经将浪漫

^①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54 页。

^② [意] 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三联书店，1986 年，第 104 页。

与现实两个主义并列的观念到回国后则倒向了现实主义。当时人们言必称的写实主义文学观念就是日后现实主义的雏形。当然,胡适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无疑得力于他那易卜生式的人文主义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沿袭着中国传统的“独善其身”的人文精神,但又对斯铎曼医生的警世名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至为推崇。可见在胡适追求现世平凡人生的同时,他并没有庸俗化,而是时刻小心翼翼地端持着绅士的架子、上流的风度。

胡适“主义”的人文气息还充分体现在他多次述说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艺复兴”性质。直到晚年他在回忆往事时还在喋喋不休地唠叨中国当时(五四)的“文艺问题,……也就是中国文艺复兴问题”,而且他还将五四运动看做是对中国文艺复兴的“一项历史的政治干扰”。^①还在加盟《新青年》之前,他就在一篇名为《论“文学”》的论文中无疑地问道:“然文学之优劣,果在其能‘济用’乎?”显然,即使是没有“济用”冲动的文学也不能说就是不好的文学,反之亦然。文学的意义是:“美感之外,兼及济用”。当然他反对文学的执意功利化是为了对文学自身个性和规律的尊重,但与此同时,他又不主张超然于功利,将文学变成文学家自我手淫。在对文学作“有所为”与“无所为”的两种区分后又进一步补充说,“无所为而为之之文学,非真无所为了。”^②把文学的本性放在第一位,由此实现对人性、人心、人情的陶冶作用,这正是他以人为本的要义:“吾又以为文学当与人事毫

①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245 页。

②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 140 页。

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但这“影响”万万不是“高头讲章之流”。显而易见，直接服务、言说政治不是胡适文学观念的初衷，但间接地影响则又是不可缺少的。

来自欧洲的文艺复兴情怀，与胡适留学美国受到的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试验的、实验的、渐进的、点滴的、改良的思想与文学追求互为表里：“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使人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精製的藝術~~ ~~藝術的精華~~），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看，这“养成”与文艺复兴传统之注重实效的人文哲学是多么的相似！应该说，胡适是文学观念的骨干家，没有他的介入，新文学运动远远不似那么精彩。

与陈独秀的笼统相比，胡适有了较为具体的文学观念。但我以为这个观念真正的“落定”还是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上。固然，我们不能否认周氏兄弟的文学观念乃至创作都不同程度受到过胡适《易卜生主义》的影响，而且他们与胡适的观念更为接近，但从周作人之“知行合一”来看，他堪称是一位文学观念的实干家。

周作人没有停滞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他将个人本位思想与文学的个人性相提并论：个人和文学的独立价值是任何社会、国家、家族、集体都不能抹杀的。为了避免众人的误解，他特意诠释“人的文学”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①针对几千年来“人格”的丧失，他要重新

^① 《周作人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45—146页。

发现“人”。重新发现人就是要一切“从个人做起”。周作人简略而又得当地说出了人的存在本质：“兽性与圣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在这个基础上他给新文学提出的要求也显得较为实在：“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容易看出，五四时期的周作人，既是一位人本主义思想家，也是一位人本主义文学家。他的“人”既是平凡的，也是平民的。比胡适的单单“平凡”又多了一份细小和琐碎，也多了一份平易和清淡。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乌衣巷》更多地带有典型的存在主义哲学里的非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色调。

“人的文学”的首倡者周作人敢于说“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已经很不简单。他反对有形的功利、提倡无形的功利更是高人一筹。1919年初的一次关于文学与人生的演讲则揭破了文学的底牌：“人生派”的毛病在于讲“功利”，把文艺当做伦理的工具而变成一种坛上“说教”。他完全反对工具论的文学观念。在一次关于儿童文学的演讲中，他说：“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供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①于是，周作人有了富有个性的“自己的园地”。

《乌衣巷》花开三朵，这固然离不开三位的个性气质。

谈“人的发现”：观念的差异是最大的差异

当新文学的先行者放走了手中的响箭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了。对人的认识之不同，以及不同观

^① 《周作人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144—145页。

念、态度造成的觉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追问与困惑,尤其是还有对中国未来文学走向的影响,总是纠缠着我们自己。这里笔者要对两个问题发难:一是态度对“人”的冲击,二是它们分别对文学的影响。

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宽容的,宽容的态度使文学精神博大、厚重,宽容的态度也使文学拥有意义上的人文关怀。这,首先需要文学观念和作家具有这样的信仰和情怀。也许,这是出给五四文化精英们的一个难题。但在文学界日益浮躁的今天,对新文学滥觞时期的五四理论家、作家一起拷问一次并不多余。

陈独秀的执意确定性与胡适的适意不确定性形成了鲜明的比较。如果说陈独秀在文学酝酿开始之时还对胡适客气有加,可当胡适抛出“改良刍议”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好像胡适的“抛砖引玉”中的“砖”俨然都是自己的。可以理解,前者是一个充满政治情绪、活跃在时代前列的精英分子。凭他的学识,不是作不了头头是道的论文,而是无法消停下来!所以当文学更新大张旗鼓地进行而胡适以温和、优柔、唯诺、谦逊的口气询问时,他可是火冒三丈了:“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主张者为绝对之是,不容他人匡正也。”^①陈独秀不是不知道讨论的需要,而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不需要、不容忍了。他所谓的“绝对之是”不过是自己的蛮横的一面之词。一副“急症等不得慢郎中”的表情。说穿了,还是急功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2年,第100页。